经济时评

互联网融资和传统融资的差异

□李 猛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融资业态竞相迸发、遍地开花。究其原因，互联网融资平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资金需求和供给的汇聚与配对，在解决资金供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风险管理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创新，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做出了重要尝试。

一方面，由于缺少合规的、真实可靠的财务报表，小微企业的信贷搜寻和审核成本较高，在难以大幅提高利率以对冲成本、难以获取抵押担保以对冲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只能选择收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对此，互联网融资平台通过自身积累和外部获取的海量数据缓解了信贷搜寻和贷前审核问题，通过第三方担保等途径应对了坏账风险问题，从而比较好地处理了资金供求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新增贷款“零风险”控制、贷款质量终身追究制等风控机制不断强化，但与之对应的收益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在小微企业贷后持续监督成本过高以及银行过度依赖于人脑（信贷员）放贷的情况下，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惜贷”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对此，互联网融资平台转而依赖电脑（电子系统）放贷，并利用大数据计算客户还款能力，强化了信用风险的约束机制，从而比较好地处理了风险管理上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主要类型

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的角度看，林林总总、多重变异的国内互联网融资业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大类。

纯中介型。无论是传统融资机构，还是互联网融资平台，坏账的风险从来都不会消失。对传统融资机构而言，坏账风险主要集中在投资人身上。对互联网融资平台而言，若其承诺垫付，那么坏账风险将从投资人转移到自己身上。纯中介型互联网融资平台的重点在于，其在投资人的借款出现逾期情形时，不承诺垫付本金和利息的责任，不承担坏账风险。显然，纯中介型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优点是有助于降低网站成本，降低网站运营风险，而缺点在于投资者风险难控，亦即，投资人很难依靠网络对借款人及其项目实施有效的审核。纯中介型互联网融资平台根据投资人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投资人，以便帮助它们寻找所谓的优质借款人，并帮助借款人寻找匹配的贷款产品；另一种主要服务于非金融机构投资人，为借贷双方提供发标、投标、交易、沟通和催收等服务。

逾期垫付型。此类平台对纯中介型平台进行了改良，其关键在于，一旦投资者借款出现逾期情形，平台承诺将垫付本息。从而，投资人的坏账风险被集聚到逾期垫付型互联网融资平台身上。在风险收益相对应的原则下，纯中介型互联网融资平台支付给投资人的收益按理应显著高于逾期垫付型平台。但国内的现状是，两类平台给投资人带来的收益相差无几。因而，大量的投资人涌向了承诺垫付的互联网融资平台。逾期垫付型平台的优点在于容易抓住做大交易量的机会，而缺点在于平台风险难控。换言之，在国内信用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平台只能依靠内部员工在线上或线下进行风险控制审核，其专业性、规范性和安全性等都值得怀疑，且运营过程中成本消耗较大。

第三方担保型。不同于前两者，其创新在于将投资人转嫁给自己的坏账风险再进一步转嫁给相关第三方（如传统小额贷款公司）。第三方对借款人进行初步审核，并且通过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推荐给平台，由平台进行第二次信用审核并发布项目信息来完成资金的筹集。一旦出现还贷资金逾期情形，第三方承担赔付资金供给者的责任。在第三方担保履约完成前，平台先行赔付。对第三方而言，它们可以从原先的自己放贷以赚取利差，转变为输送借款人并承担担保责任以赚取服务费，业务空间得到拓展。第三方担保型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优点在于给投资人传递了保障重重的信号，而缺点在于担保物的本身存在风险，也就是说，在担保物重复担保等情况出现时，坏账风险将再次回到互联网融资平台上。

数据支撑型。此类平台的突破在于克服了上述三类平台的一个共同缺陷——贷前调查，即难以有效地摸清客户的现金流以判断其是否有还款能力、是否有还款意愿。对此，平台可以对网络内积累的商户交易数据（如客户评价度数据、货运数据、口碑评价等）进行量化处理，同时借鉴网络外的数据（如海关数据、缴税数据、用水用电数据等）加以匹配，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标准体系，并通过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库模型，对借款人进行数据库跟踪管理。当然，数据不仅是数据支撑型平台的优势，也是其瓶颈，因为它们难以服务于数据库之外的借款人。不仅如此，微贷技术人才短缺、小额贷款公司身份不明确、资本金限制等也成为了制约因素。数据支撑型平台主要涉及电子商务企业，其在前期积累了丰富的互联网产业运营经验和巨大的客户数据库，拥有开展互联网融资业务的比较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是其他互联网融资平台所难以复制和推广的。

数据支撑型互联网融资平台与传统融资的差异

不难发现，数据支撑型平台在数据分析、信用审核和互联网化交易中更胜一筹，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线上审核和风险管控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更加契合了互联网融资的本质，而纯中介型、逾期垫付型和第三方担保型平台依旧不同程度地依靠了传统的审核方式，更多地采用线下调查和有限担保等方式。那么，作为比较优势最突出的互联网融资平台，数据支撑型平台究竟有何创新，它与传统融资模式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在资金需求方面，基于数据支撑型的互联网融资模式主要依靠互联网搜寻潜在的借款者，而传统融资模式主要依靠营业网点等有形节点搜寻前者的借款者。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通过交易平台对商户认证和注册信息、历史交易记录、客户交互行为、销售数据、银行流水、海关进出口信息、水电费缴纳、婚姻状况等诸多信息进行定量分析，还可以通过引入心理测试系统判断商户性格特征，通过模型测评分析商户对假设情景的掩饰程度和撒谎程度，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借款人的经营与信用特征以及偿债能力。通过大数据以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分析，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获得客户征信记录，并批量快速搜寻潜在的借款人，极大地降低了借款人的筛选成本。

比较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则依据《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实地为主、间接为辅的方式展开贷前调查，采取现场核实、电话查问以及信息咨询等途径和方法，主要依靠营业网点、商会、市场、人行征信系统以及客户推荐等有形节点搜寻潜在的借款人。对于潜在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能力，则依据客户经理上门调查、现场审核、财务分析等方式审核。

在资金供给方面，基于数据支撑型的互联网融资模式可以通过商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渠道、资产证券化和上市等途径融通资金，而传统融资模式可以通过吸收存款和同业拆借等渠道融通资金。除了注册资本，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通的资金可以达到注册资本的50%，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例如信托融资、证券化甚至上市。不仅如此，互联网融资平台还可以使用商户沉淀的交易结算资金，这部分资金不用支付利息，且随着交易量增长而自然增长，较为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通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的模式，使得商户在有资金需求时找上门来，资金使用完毕后可当即归还。这种随借随还模式匹配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阶段性和灵活性特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周转速度，变相地增加可贷资金量。

比较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则通过股本、吸收个人存款、单位存款、财政性存款、临时性存款、委托存款等途径增加资金供给能力，以及通过债券市场、同业存款和同业拆借、向中央银行借款、各种应付款项以及预收款项等其他资金来源获取资金。

在风险控制方面，基于数据支撑型的互联网融资模式通过“软信息”和支付系统防范坏账风险，而传统融资模式利用“硬信息”和抵押担保控制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贷款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质押贷款，即当商户有“卖家已发货”的订单时即可申请的贷款，其实质是订单质押贷款；另一类是无质押贷款，包括商户的纯信用贷款、循环贷款和固定贷款，其实质是完全的无担保、无抵押。对于无质押贷款：在放贷前，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通过查看客户历史信用和资金流转记录等“软信息”判断其信用水平；在放贷后，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通过支付系统监控客户现金流，查看贷款申请目的与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相符，在发现违约时可以通过切断客户现金流及其他措施降低了坏账风险。

比较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放贷前，往往通过搜寻客户的“硬信息”（如财务报表、抵押担保以及信用记录等）判断其信用水平；而在其放贷后，往往通过客户透明的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小微企业的资金投向、经营情况，并通过控制抵押担保物覆盖风险。

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

□李宏伟 卢广山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是十八大顶层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化解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内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发展战略和思路，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优化和升级。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推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互相融入、互相支撑、共生发展和融合发展。

树立以科技创新推动两个文明融合发展的理念。工业文明是发展之本，是经济发展支撑所在，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要遏制工业化，也不是简单的环保行为，而是要统筹布局。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系统工程，要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资源生产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修复自然的能力。科技创新是新时期转变发展方式、改变工业模式、加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倍增器，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

以系统工程思路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系统工程思路，构建“以科技为基础，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为方向，发展工业强国和生态文明为任务”三位一体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等手段，加快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推动工业化和生态化双重进步，实现产业共生、生态和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适应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相适应的能源发展新战略，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和发展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污染排放治理好，全面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和“五位一体”发展目标。

构建适应中国发展实际，统筹工业和生态发展要求的功能区域布局。要根据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工业发展实际，按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适应工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要求的新型工业生态功能区域布局，统筹工业科技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解决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保障问题，构建跨部门的顶层战略、规划与管理部门。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要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依靠制度、法治和顶层协调机构来落实。因此，要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系统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系统完整的制度法律体系来保证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实现，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顶层战略、规划与监管机构，通过执行最严格的制度、实施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构建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理念、文化和宣传的统一体系，大力倡导资源节约理念，推动生活方式转变。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因此，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必须要从资源节约这个源头抓起，把节约资源作为根本之策。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生态节能环保理念，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宣传和价值观体系，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推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向绿色、节约、低碳、环保和循环利用方向转变。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全面建立以考核增长质量为主的过程导向的指标考核体系。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指挥棒。以前我国的考核评价体系主要以考核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只注重结果，唯GDP论英雄，并不关注增长的具体来源，更不关注增长所消耗的资源，对环境的损害和生态效益等隐性代价和成本。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资源投入大、效率低、当前见效快的低水平产业，不考虑发展的质量效益和资源环境代价。所以，必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的方向，建立以考核增长质量为主的过程导向的指标考核评价体系，在考核总量增长的同时，把增长总量中通过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量占增长总量的比重、万元GDP能耗降幅、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指标纳入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使之成为重要导向和约束，引导全社会逐步向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增长的发展方式转型。

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和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构建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解决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改革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打通产学研合作的通道和模式，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的关键问题，把基础前沿、关键共性、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来抓，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瓶颈。从国家层面建立科技创新统筹协调机制，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避免“创新孤岛”。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

加速教育改革，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要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就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力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在创新活动中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创新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支撑条件。在吸引人才方面，要加大对高等院校关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的投入支持力度，通过项目牵引，引导全社会优势人力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流动，要制定一系列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措施，为人才创造能够安心发展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发展之路

经济体制

让政府有形之手更有形

□闻新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再次聚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要求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须使二者各司其事，各尽其责，互补而不跨界。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辩证关系要突出关注两大方面。一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须以正确发挥政府作用为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作用发挥不当，特别是政府过度发挥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得适得其所，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释放出来。二是政府作用要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市场的力量还是比较欠缺，在全面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决定性作用有待拓展的空间还很大，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实施上要起重要作用，要争当市场维护型政府。

有形之手的无形之弊

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比喻为“看不见的手”，其实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无形之困也处处存在。因此，在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方向上迈进时，还必须看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无形之弊。

政府有形之手过多，无形之中随时都可伸出一张手来。政府责任过宽，自由裁量权过大，无穷尽的手使得政府类似百变千手观音，但现实中政府不可能成为“神通广大”的千手观音，正因政府所谓“看得见的手”不受约束，险招、失招的可能性就很大，好事就很难办好。

政府行为不够透明，潜规则泛滥。政府“看得见的手”在很多重要方面甚于“看不见的手”，结果政治生态环境遭受污染，贪腐严重，社会交易成本增加，收入差距恶化，最终也导致经济失衡。特别是社会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信任体系溃如滑铁卢，社会活力的恢复就会超过弹性限度，经济社会秩序再造的难度加大。

政府信息功能异化，信息公开缺失。政府部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会生成很多有用信息，如土地利用信息、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等信息，这些信息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决策非常重要，但没能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开。一些政府掌握的数据，因为政绩考核需要，人为操控导致信息失真。还有政府出于一时的利益考虑，有意设置一道道信息屏障，使经济生活中以价格信号为核心的“看不见的手”发生严重扭曲，加上市场主体的潮涌追赶，让市场背上失灵的黑锅，最终也会增加综合性系统风险。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之一，而且主要以公共产品的方式配置资源。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中国，更是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作了精准定位，这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遵循问题导向和改革发展的逻辑，砍掉政府不当的有形与无形之手。



将有形之手置于阳光下

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资本以及市场化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为了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和完善资本机制，政府在某些方面应以积极退出的方式发挥作用，再也不能用老式办法，取而代之的是取消政府对资源的不当控制和配置，实现政府的华丽转型。

以“负面清单”限定政府权限。按“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要求限定政府权限，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同时将“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结合起来，对政府实行“法无明文不可为”，并将政府的“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相结合，突出权责统一关系，强化责任到人的问责机制。

将“静态清单”与“动态清单”相结合。“静态清单”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动态清单”揭示政府怎么做的问题。改变政府重视建大楼、不重视建档案的习惯，强化政府档案管理，建立政府工作程序记载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程序化记录管理。实行政府实绩档案管理，使政府行为过程留有痕迹，权力清单的动态追溯过程体现在工作实绩档案中，让实绩管理台账见证权力清单，让政府权力运行过程有账可查、清楚明白。

信息公开透明。按政府行为范围的限定原则和透明化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功能，做到政府信息共享，防止信息失真。通过公开防止信息截留和屏蔽，并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对政府进行信息化控制。政府部门生成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安全外，只要社会需要都要及时全面公开。政府控制和配置资源的信息、政府权力运行信息、政府公证登记管理信息等是信息公开的重点，当前财政预决算信息、人地关系信息、住房保有量信息等是公开的关键点和切入点。

显规则代替潜规则。提高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杜绝暗箱操作。在经济领域，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公共权力领域，完善用人选人制度和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将政府有形之手置于阳光监督之下，对于防治腐败、提高效率、纠正错误大有益处。让政府有形之手更有形，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